

一部富有创新精神的因明专著

——评郑伟宏教授的《汉传佛教因明研究》

◎韩廷杰

因明是世界三大逻辑源头之一,是一门辩论术、逻辑和认识论三结合的学问,对于研究中国逻辑史、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印度逻辑史、敦煌学、论辩学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但从明末到清末数百年间几乎成为绝学。近



由于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我国因明学者的积极努力,优秀成果层出不穷,郑伟宏教授的《汉传佛教因明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这部专著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999 年的一般项目,2002 年结项后又经两次修改,于 2007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可见郑伟宏教授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这部专著是他的心血之作。

作者熟练运用历史分析方法、整体论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对我国汉地因明从唐代输入开始,一直讲到现代,进行系统论述,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纠正了自唐以来国内外代表性论著的一系列失误,本书在国内外因明研究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这部专著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有重要发现和创新见解,现举例说明如下:

舍尔巴茨基认为陈那创立的新因明乃至古因明和足目《正理经》的五支作法都是演绎推理。郑教授指出:《正理经》乃至古因明的五支作法,只是类比推理。陈那创立的新因明,同喻体和异喻体都是以九句因的

二、八句正因为基础,其同品和异品都是除宗支有法,所以只是除外命题,并非全称命题,所以新因明也不是演绎推理,离演绎推理还有一步之差。真正达到演绎推理水平的,是古印度七世纪的另一位因明专家——法称,他所

说因三相的后二相,即同品定有性和异品遍无性,此中同品和异品不再除宗支有法,已经由陈那的除外命题演变为全称命题。舍氏把陈那和法称二

位因明大师因三相的后二相等同看待,没有看出二者之间的区别,由此引发一系列错误。

关于真唯识量的研究,作者也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唐玄奘在印度学满将要回国之际,戒日王为他举办万人无遮大会(任何人皆可参加的大会),玄奘抛出阐发唯识观点的“唯识比量”,又称为“真唯识量”。具体如下:

宗 真故极成色,不离于眼识。

因 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

喻 如眼识。

玄奘发誓说:谁能破一字,他将斩头相谢。十八日来,没有一人敢应战。戒日王宣布论主玄奘获胜,让他骑大象绕场一周,众人向他欢呼致敬。大乘佛教徒送给他“大乘天”的光荣称号,小乘佛教徒送给他“解脱天”的光荣称号。不久后,玄奘载誉回国。

会后古今中外很多因明学家评论此事,褒贬不一,意见分歧很大,争论不休。有人把“唯识比量”盛赞为“万代立量之通轨”,有人却认为是权宜之计。日本因明学家风谭的《瑞源记》称:“今详三藏一时之用,将以对敌,未必即堪久后流行。”^[1]

郑教授对这古今中外争论不休的重大因明问题,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对有关因明学者评论其得失。“唯识比量”究竟是自比量还是共比量,因明学界存在两种不同意见:文轨的《庄严疏》和玄奘高足窥基的《因明大疏》都认为是共比量,近现代很多因明学者如吕澂、虞愚等都因循这种观点。另一位现代著名因明学家沈剑英先生却认为是自比量。

郑教授同意是自比量,但其具体分析又有很多方面不同于沈剑英先生。沈剑英先生的《因明学研究》第六章《三种比量与简别方法》对“唯识比量”三支逐一分析后下结论说:“玄奘的‘真唯识量’集中地表述了法相唯识哲学的基本观点,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从因明学的角度来说,它也决不是‘万世立量之正轨’,而只是‘似能立’(错误的论证)而已!因此这个所谓‘无有一人敢破斥者’的唯识比量,是并不难破的。”^[2]可见沈先生对玄奘的“唯识比量”持全盘否定观点。

郑教授认为:玄奘的唯识比量“由于它是自比量,所以起不到破他的作用,只能救自。玄奘打的不过是防御战。”^[3]可见郑教授认为玄奘的“唯识比量”作为自比量是站得住脚的,能起到“救自”的目的,使敌论者无隙可乘。十八日来,无一人敢应战,原因就在于此。

郑教授对罗照先生的两篇论文也进行了评论:“罗照先生对‘真唯识量’的研究是花了大力气的。他对奘量的宗、因、喻三支中所有的概念都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对相关的唯识理论也有详细的阐发,运用形式逻辑来评判奘量也最为突出。他公开发表的两篇论文《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真唯识量’——与沈剑英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商榷》)和《有关‘真唯识量’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几个问题》),都是尖锐批评沈文的。沈文批判玄奘‘真唯识量’的观点和态度从总体而言我并不赞

成,在此不论。认真地研究罗照二论,便发现二论所运用的三种比量的知识是片面的,甚至有误解,所运用的形式逻辑知识陈旧且不乏错误,对宗、因、喻三支的分析几乎全盘因循文轨和窥基的曲解,值得商榷。二文对奘量三支中的概念所作的分析甚至比唐代慈恩宗人更为繁琐,并且最终还导致自相矛盾。这使我不对二文关于奘量的评价打个问号。”^[4]

郑教授与其高足汤铭钧的论文《弘斯正理门,妙尽自他共——论玄奘对因明的历史贡献》,在论述“真唯识量”的时候,又对罗文进行详细评论。罗照两篇论文的基本观点是:“按照因明的标准,玄奘的‘唯识比量’是严密的,而用逻辑的标准来衡量则是诡辩”^[5]。郑教授从三个方面指出罗照所依据的因明标准和逻辑标准都有问题。第一,罗照关于三种比量的定义都只讲概念是否极成,而只字不提判断是否极成。这是片面的,不符合因明大、小二论关于共比量的因、喻在概念和判断两方面都必须共许极成的规定,不符合《大疏》关于三种比量大量实例的解释。第二,罗照认为共比量再加“自许”简别是“唯识比量”的特例,是出于立论的特殊需要,“这样简别之后,仍包含着原来共许的对象,所以仍为共比量”。可以引进敌方不许的对象而不改变共比量的性质,这显然不符合三种比量的判定标准。第三,罗照认为:“‘初三摄眼所不摄’,作为宾词,在逻辑上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两个概念,不应当把它从中一刀两断。”这与唐疏的解释不合。而且“作为宾词”的不是一个“概念”,恰恰是一个可以分割的联言判断,它包含两个简单判断:“色为初三摄”和“色为眼所不摄。”

其次,罗照的“逻辑标准”也很不标准。第一,他认为“唯识比量”除了“真故”和同喻依“眼识”以外,实际上包含四个概念:“极成色”、“不离于眼识”、“色所摄”、“眼识所摄”,有“四名词”错误。但是,三支作法首先就有个是否演绎的问题,即使把它当作演绎的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三段论。严格来说,“唯识比量”是一个关系推理,它有没有过失与它是否四名词并无必然

联系。

第二,罗照批评玄奘的因支是“丐词”,其推理有“预期理由”的错误。这一批评完全不顾因支与宗支之间的理由与推断关系,断言“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实际上即“自许色为眼识所摄”,“这是两个表面上不同而实质相同的概念”,“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与“自许色为眼识所摄”分明是两个不同的判断,况且前者还是一个联言判断,显然不能混为一谈。至于认为它们是“概念”,更不知从何说起。

第三,罗照对形式逻辑的概念理论也有误解。他说:“从概念的外延上看,‘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属于上位概念,‘初三摄眼所不摄’属于下位概念。”但是,“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初三摄眼所不摄”是两个判断而不是两个概念,罗文在这里混淆了概念和判断。假若将这两个判断视为概念,那也应该是前者的内涵比后者多出了一个“自许”。在形式逻辑中,内涵的增加必导致外延的变小,反之亦然。这正是内涵与外延的反变关系。罗照认为“‘自许’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初三摄眼所不摄’的外延”,这有违逻辑常识。对于“初三摄眼所不摄”与“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罗照又以“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共同的边界”与“美国本身的边界”之间的关系来类比。实际上,“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共同的边界”与“美国本身的边界”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罗照把“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与“初三摄眼所不摄”既说成上、下位关系,又比作整体与部分关系,实际上混淆了属种关系(相容关系)和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相容关系)。

郑伟宏教授之所以在因明研究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还因为他娴熟运用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的方法。这种比较研究必须建立在因明和逻辑两方面的知识都正确的基础上,必须具备这两方面的丰富知识,郑教授具备这种能力。纵观一个世纪来的比较研究,在郑教授看来,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因明的“全分”、“一分”本来不等于逻辑的“全称”、“特称”,从谢无量到陈望道再到石村,都视为等同。因明的“表诠”、“遮诠”本

来只是指称逻辑的正、负概念,从谢无量到陈望道,再到石村,再到沈剑英,都误解为肯定、否定判断。在这方面,石村先生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的《因明述要》一书,把表诠与全分、一分分别结合,又把遮诠与全分、一分分别结合,便得到与形式逻辑“相似”、“一致”的四种命题形式:全称肯定(A)、全称否定(E)、特称肯定(I)和特称否定(O)。

有的研究者如姚南强把互相矛盾的概念用属种关系的图解来表示。有的学者如黄志强的论文《因三相管见》,把因的第一相解释成同喻体,某些专家竟然称赞这种错误的观点为“警世之作”,“开辟了因明研究的新领域”。黄志强又把二、八正因说成是矛盾关系,这就完全背离了因明与形式逻辑的基本常识。

前苏联的因明学家舍尔巴茨基认为三支作法中有三段论的AAA式和EAE式,沈剑英、巫寿康先生遵从其说,也是对三支作法和三段论知识的误解。郑教授指出:“退一步说,陈那三支作法即使是演绎推理,也不能与三段论作简单比较。例如:

诸有常住见非勤勇无间所发,
声是勤勇无间所发,
所以,声是无常。

在上述‘三段论’中,结论是肯定命题,按照规则,两前提必为肯定命题,不可能是EAE式。上述‘三段论’不是三名词,而是五名词:声、常住、非勤勇无间所发、勤勇无间所发、无常。如果把大前提处理成否定命题则为四名词,有四名词或五名词的‘三段论’必须先化归,使之成为三名词的三段论,然后才能判定属第几格。这一错误在好多论著中出现,因此特别提出来。更要提醒的是,单用异喻体是不能与因、宗组成论式的,这也是陈那新因明的基本常识。”^[6]

郑教授的论文《论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一文系统论述这一问题,认为:“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不仅有可能,而且很有必要,甚至非常重要。”又说:“逻辑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它在研究论证形式方面是指南

针。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揭示因明的特点,才能认识到因明的理论价值,也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真正认清因明的本质,才能看出它在整个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1]作者认为:陈大齐教授之所以在半个多世纪中独占鳌头,就得力于其很高的逻辑修养和对许多因明基本概念的准确把握。他利用比较研究方法准确阐发了因明的很多重要概念,如表诠和遮诠,全分和一分,同品定有性和同喻体,因的第二相和第三相等。

但有不少研究者在比较研究方面犯了很多错误。一百多年以来,在因明论著中用错误的逻辑知识比附错误的因明知识,比比皆是。如龚家骅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逻辑与因明》一书,有很多结论既违反因明常识,又违反逻辑常识,他用逻辑的三条基本规律比附因三相,认为遍是宗法性与充足理由原理相似,同品定有性与同一律相似,异品遍无性与矛盾律、拒中律相似,又把因明的量论与逻辑的内涵与外延相比附,还把三种比量的简别与假言推理相提并论,谬误百出。王季同则步舍尔巴茨基的后尘,把因明三支说成是与西方逻辑中穆勒五法相当。黄志强则把九句因的二、八正因说成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认为第八句因不是正因。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见在比较研究

领域存在不少问题。

总之,郑伟宏教授是一位自成一家、自成体系的因明专家,他的理论基础是同、异喻体都要除宗有法。除《汉传佛教因明研究》以外,他的其他著作如《因明正理门论直解》等,还有一些论文,反复强调这一问题。我们期望郑教授再有新著问世,为因明研究的百花园再添异彩。

【注 释】

[1] [日]凤谭:《因明论疏瑞源记》卷四第十四页左,引高山定寅说,台南:智者出版社,2002年。

[2] 沈剑英:《因明学研究》(修订本),第196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

[3] 郑伟宏:《汉传佛教因明研究》,第24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4] 郑伟宏:《汉传佛教因明研究》,第450—451页。

[5] 郑伟宏、汤铭钧:“弘斯正理门 妙尽自他共——论玄奘对因明的历史贡献”,第561页,载黄心川等编:《第三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8年,下引罗照说,均见此文。

[6] 郑伟宏:《汉传佛教因明研究》,第499页。

[7] 郑伟宏:“论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兼评黄志强的佛教逻辑现代研究”,第196页,载《因明》第一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广西佛教协会会址南宁天宁寺举行开工仪式

本刊讯 11月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佛教协会会址天宁寺在南宁良凤江国家森林公园举行隆重的开工仪式。来自全区各地的寺庙负责人、四众弟子600多人参加开工仪式,自治区宗教局局长林东昭、自治区林业局巡视员廖培来,以及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南宁市委统战部、宗教局、经济技术开发区、良凤江国家森林公园等部门的有关领导应邀出席开工仪式,并为工程开工培土。

林东昭局长在开工仪式上发表讲话,他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对天宁寺的开工建设表

示热烈的祝贺。广西佛教协会会长释成清在开工仪式上介绍了天宁寺的筹建情况。他代表广西佛教协会对关心、支持天宁寺建设的党、政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以及广大信众表示衷心感谢。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十分重视解决广西佛教协会办公场所问题,对天宁寺的筹建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天宁寺建设用地25亩,大雄宝殿建筑面积1006平米,采用明清建筑风格,建成后将为广西佛教协会的永久会址。

(韦国先)